图书情报工作
第63卷 第8期 2019年4月

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核心话语演变分析：以1980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为例*

■ 汪汉清　樊振佳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　天津 300071

摘要：[**目的/意义**]对我国自1980年以来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核心话语体系构建及其演变进行研究、对话语形成的社会背景进行剖析、对话语实践进行统计与描述，以期为精准化涉农信息服务研究提供参考。[**方法/过程**]采用定性分析方法，运用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从文本向度、话语实践向度、社会实践向度三3个向度对1980以来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文本及其核心话语的演变进行分析，以中央一号文件为文本分析对象，对其进行话语提取、编码与归类。[**结果/结论**]1980年以来我国涉农信息服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82－1986年，核心话语集中在有限的主体、对象、内容和较低的服务层次，基层基础设施建设总体发展缓慢；第二阶段为2004年至今，涉农信息服务不局限于传统的农民、农业活动以及农村地域，对象呈现多样化，服务主体规模扩大，两者界限不鲜明，服务内容呈现制度化、规模化、个性化特征，涉农信息服务服务体系逐渐形成。两阶段各有其发展特点与特色，又具有延续性和一致性、延伸性和发展性。

关键词：信息服务　政策文本　话语分析　中央一号文件
分类号：G203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19.08.012

1　引言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时期。我国各级政府均加大了对于涉农信息服务的支持和投入。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把农业信息服务工作作为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求"积极推进农村信息化、健全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在2018年的乡村振兴战略中，也明确指出农村信息化建设等涉农信息服务对于振兴乡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涉农信息服务，要求健全涉农信息服务体系，充分说明了涉农信息服务的重要性。

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文本作为我国涉农信息服务的指导性文件，对我国涉农信息服务的发展具有计划、指导、引领的作用，对涉农信息服务的实践层面上有指导性、权威性的特点，是涉农信息服务发展的重要保障，但因为我国农民群体基数大，分布广泛，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涉农信息服务实践水平差距大，导致其话语体系的构建仍面临着巨大挑战。因此，无论是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都有必要对涉农信息服务政策话语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旨在探讨我国自1980年以来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核心话语建构及其演变，对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话语体系的意义建构过程进行剖析，并试图从外部因素（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和内部因素（话语实践的变化与发展）对涉农信息政策话语的变迁进行解释，为未来涉农信息服务政策的研究、制订和实施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

根据于良芝等[1]的回顾，涉农信息服务研究始于20世纪初学者们对于农业专业化信息（agricultural information）的研究，最初对于涉农信息服务的研究集中于如何把农业科技信息传递到农民手中。从20世纪

* 本文系天津市社科青年项目"'双创'背景下农村创客信息采纳能力研究"（项目编号：TJTQ16－001Q）和南开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基础研究项目"面向精准扶贫脱贫的农村创业信息服务研究"（项目编号：AS1706）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汪汉清（ORCID：0000－0001－9507－7323），硕士研究生；樊振佳（ORCID：0000－0003－4966－6965），讲师，博士，通讯作者，E-mail：fanzhenjia@nankai.edu.cn。
收稿日期：2018－08－02　修回日期：2018－11－27　本文起止页码：96－106　本文责任编辑：杜杏叶

汪汉清，樊振佳. 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核心话语演变分析：以1980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2019,63(8):96－106.

30年代到50年代，其他信息（如农产品销售信息、农村经济信息）的提供，也开始广受农业研究、社会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学者的关注。20世纪70－80年代，由于建构主义信息理论的兴起，信息不平等、信息鸿沟、小世界等理论的影响，涉农信息服务社会环境和实践的变化与发展，信息需求、信息平等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促使研究者以用户需求和信息公平的角度为出发点考虑涉农信息服务，研究的视野开始扩大到更广泛的信息领域，研究层次不断深入。在国内，农村改革开始实行，使得农民的信息需求（生产经营信息、政策信息、创业信息等）大大丰富；同时，农村地区的发展备受关注，针对农村居民的信息需求给予相应的信息服务的政策支持，使得学者开始关注这一领域的发展。

由于涉农信息服务具有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图书馆学情报学、农业科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对此均有所关注。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将从涉农信息服务对象与主体、涉农信息服务内容以及涉农信息服务平台与模式三部分对涉农信息服务研究进行回顾。

2.1 涉农信息服务对象和主体

涉农信息服务对象，即涉农信息服务的用户，涉农信息服务向谁提供服务，这是涉农信息服务建设的目的与归宿。现有研究通常用"农民（指从事农业劳动的群体）"或"农村居民（在农村地区生活的群体）"来界定服务对象与用户，然而，由于传统农民身份的转变、活动区域的扩大化、活动内容的多样化，农民与农村居民的概念互有交叉，因此，研究者们对于涉农信息服务对象难以形成共识，很多研究中将农民和农村居民视为同一群体[2]。除此之外，对特定服务对象，如农村弱势群体（女性、农村留守儿童、老人、残疾人等）、农民工群体以及返乡农民等的研究，学者们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3-5]。

国外研究中，对于弱势群体的研究是近年来的热点，尤其是女性和儿童的权益颇受关注。E. E. Adomi[6]、G. J. Leckie[7]研究了女性的社会角色对她们获取和利用农业信息服务的影响，N. Shaifuddin[8]讨论了马来西亚农村青年对信息来源和农村图书馆服务的看法，发现农村青年偏好继续教育信息服务。

涉农信息服务主体，指涉农信息服务由谁提供，是服务的提供者，它的界定决定信息服务的责任归属。学者们普遍认为，政府和非营利性机构应当是涉农信息服务主体。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式涉农信息服务成为现今涉农信息服务的主要模式。农业科研机构和农业高校等由于其性质的特殊性，在涉农信息服务的提供中也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社会力量介入也成为一种趋势，一般有两种模式，一是由政府向营利性机构购买相关服务（如服务平台和资源等），再向农民免费开放；二是非营利性信息服务机构将信息服务项目外包给经营性机构，再向农民免费开放，依然是以政府为主导。

2.2 涉农信息服务制约因素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水平难以满足涉农信息服务对象的多样化信息需求，而这是由用户和提供者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的——信息服务提供者供给能力不足、宣传意识薄弱、服务能力不足与信息服务需求者信息意识薄弱、获取能力不足[9-10]。国外研究中，针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诸如非洲、南亚、东南亚等的研究和针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主要是信息服务的现状、应用和建议，尤其是ICT的应用；针对发达地区和国家，如北美、西欧、澳大利亚等的研究重点则是信息源、信息服务水平、信息素养教育与信息不平等问题[11-14]。

2.3 涉农信息服务平台与模式

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和农业、农村信息化的提出，大量关于涉农信息服务平台和服务模式的研究涌现，张莹[15]在对东北某市农村信息服务平台的调查中发现，农村信息服务平台存在信息质量不高、信息表现形式不符合农民信息获取能力、信息服务机构不协同、信息服务渠道不合理以及顶层规划缺乏专业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等问题；马凌、侯正伟[16]对我国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进行了分析，认为现有的农村信息平台建设，难以将涉农信息准确及时地传递给用户。于良芝等[1]在其研究中依据信息专业化程度，将农村信息服务模式分综合性信息服务和农业专业化信息服务两类。由于专业化信息服务要求更精确，对于目前多数地区的服务能力而言，还难以达到。

同时，对于图书馆、图书室、农家书屋等传统实体服务平台的研究也一直是热点，如何更好地发挥农村传统实体信息服务平台的作用是许多学者都在关注的问题[17-18]。近年来，随着心连心家庭图书馆、杨霄松家庭图书馆的发展，基层公益性私人图书馆在涉农信息服务上发挥的作用也开始吸引研究者的注意[19-21]。此外，张健、李红霞等[22-23]则关注到高校图书馆，尤其是农业高校图书馆在涉农信息服务中具有的优势以及应该发挥的作用。

2.4 研究述评

目前我国对于涉农信息服务的研究多集中于涉农

信息服务的现状研究，从涉农信息服务研究现状来看，在内容上，主要集中于对于涉农信息服务的现状、推广与存在的问题等基于实践现象的研究与讨论，而疏于对具有涉农信息服务指导性作用的政策给予调查和分析，以政策的导向性意图为切入点对我国目前涉农信息服务体系进行描述和阐释；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实证研究和主观经验解释，鲜有从话语分析这一角度对现有涉农信息服务政策的意义建构过程进行分析与解释。在涉农信息服务政策上，主要是对政府涉农信息服务供给手段和方式的研究，从而给予政府相关决策支持。在对农民信息劣势的解释中，以农民的地域劣势、收入和教育水平劣势与市场机制两种理论为主，尽管于良芝等[2]在其研究中引入了国家意志解释理论，但现有研究较少以此为切入点。

3 研究设计

3.1 基本概念界定

政策是政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任务而制定的行动纲领、方针和准则，是为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方针，是政党或国家意志的体现，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关社会群体实施相关社会活动的依据和指导方针，对社会成员和群体具有一定的制约性[24]。政策是国家或政党意志的体现，其文本话语表述实质上体现出政府对相关社会活动的指向性、引导性意图，可能是明确表达的要求，也可能是暗含意义的隐喻。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文本是涉农信息服务发展的重要保障，总是显性或隐性地影响涉农信息服务的推进与发展。

话语指一个领域根据特定的历史发展、文化演变和制度性规则（区别于语法规则），运用语言材料表达意义、建构知识的各种陈述的集合，是我们在谈论特定领域和学科的事物或题目时形成的陈述的集合，例如：法律、政策、规则、统计数据、研究文献等[25]。话语在文本和实践上具有强烈的权势关系和意识形态倾向，一个领域的话语一旦形成，它就决定对于特定事物或题目表达的“合法性”。通过对话语进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揭示话语“合法性”的建构过程及其历史局限[26]。

目前政策话语分析研究主要分为作为诠释工具和作为批判工具两类[27]。作为诠释工具的政策话语分析从意义维度对政策文本、政策现象和政策问题进行分析与诠释，认为意义的初建、传播、冲突、变迁决定了政策的演变；作为批判工具的政策话语分析也从意义维度进行研究，但关注揭示现实政治制度的局限性，尤其是权利——知识关系的构建，从而探讨现有政策的必要性和其他公共政策可选择性。费尔克拉夫在继承和创新福柯话语——权力思想（福柯认为，话语不单是纯粹的语言形式，而是始终与话语实践相联系的，是陈述的集合，具有建构性、互为话语性和互文性的重要特点）的基础上，结合系统功能语言学思想以及西方话语理论的许多研究成果，开创了在“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三个向度上的话语分析体系，以社会实践和文本为研究对象，强调研究话语的建构和社会实践，侧重语言的社会属性和实践特征，使其成为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研究方法[28]。

3.2 研究问题与方法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自 1980 年以来，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核心话语体系是如何建构和变迁以及对应的话语性实践是如何表现的？

本文运用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框架[29]，从文本向度、话语实践向度、社会实践向度三个向度对 1980 年以来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核心话语的演变进行分析。结合研究问题，本研究形成“社会语境——文本——话语实践”三向度话语分析框架，对历年中央一号文件核心话语演变进行分析，包括：

（1）社会语境向度。指对涉农信息服务政策话语形成的外在制约条件——政治背景、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和技术背景等进行分析，特定的社会语境下，由于政治目的不同，统治阶级会产生不同的政策话语建构需要，从而实现其对各种社会群体的社会活动的引导。社会实践向度分析将话语置于话语——权力关系之中，侧重话语的社会语境分析，包括政治背景、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和技术背景等，注重话语形成的社会背景因素。

（2）文本向度。关注文本语言分析，是微观层次上的分析，是描述具体文本语言学特征，包括语法、语义和语词表达等。通过对不同类型政策文本的浏览与梳理，本文选择的文本分析对象是中央政府发布的、关于“三农问题”的共 20 个历年一号文件（1982 – 1986 年、2004 – 2018 年），其中 2011 年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不具有完整政策文本分析意义，予以剔除，因此文本分析对象共 19 个（如表 1 所示），获取其中涉农信息服务话语，并对其进行编码进而归类，形成多个核心话语并观察其演变特征与规律。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事关“三农”问题政策文件的专有名词，是解读三农的重要文献来源。因此，选取

汪汉清，樊振佳. 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核心话语演变分析：以 1980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2019，63(8)：96－106.

历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有关涉农信息服务的核心话语，将其作为研究的依据，具有逻辑上的可行性。

（3）话语实践向度。阐释文本生产过程、分配过程和消费过程，是宏观层次上的分析，侧重文本分析和社会实践的联系，包含话语实践成果与话语实践不足等。

表 1　1980 年以来“涉农”中央一号文件列表

编号	年份	文件名称
D01	1982	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
D02	1983	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
D03	1984	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
D04	1985	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D05	1986	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
D06	2004	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
D07	2005	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D08	2006	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D09	2007	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D10	2008	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
D11	2009	关于 2009 年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若干意见
D12	2010	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D13	2012	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
D14	2013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
D15	2014	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D16	2015	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
D17	2016	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D18	2017	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
D19	2018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4　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核心话语及其演变

自 1980 年以来，我国涉农信息服务经历了服务对象的丰富化、服务主体的扩大化、服务内容的多样化以及服务模式等转变，基于这种转变，本研究将涉农信息服务政策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 1982－1986 年，第二阶段为 2004－2018 年。

4.1　1982－1986 年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核心话语演变分析

4.1.1　社会语境向度分析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体制处于重建和恢复状态，政治形势逐渐趋于平稳。该时期，经济发展成为全社会的首要任务。农村改革开始进行，“三农”问题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连续五年发表了与“三农”问题有关的中央一号文件。此时，城市改革也在大刀阔斧的进行，相较于城市改革，农村改革并没有获得同样的关注，其改革力度和规模都难以企及城市。由于城市发展需要从农村提取剩余，农村需要对城市进行补贴[2]，涉农信息服务发展并未获得足够的支持和投入。随着农业经济地位的下降，中央政府逐渐将农村农业服务任务转移至地方政府，鼓励农村服务的市场化经营，导致涉农信息服务软硬件设施建设的边缘化。再者，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小，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小，涉农信息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囿于农村区域。从技术背景看，农村信息基础设施主要依赖于电话、广播电视设施。

4.1.2　文本向度分析　基于对 5 年间中央一号文件的分析和对政策文本内话语相关文本的摘取，得到相关表述并对其进行编码和分类，本文提取出涉农信息服务对象、涉农信息服务主体和涉农信息服务内容与模式三类涉农信息服务核心话语，据此分析这一时期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核心话语演变显现的特征与规律。同时，对 5 个文件中的高频词进行统计（由于政策文本陈述时常省略服务主体，因此对于涉农信息服务主体陈述将不进行词频统计，下同）以观察涉农信息服务主题、内容及话语秩序，这一阶段高频词如图 1 所示：



图 1　1982－1986 年中央一号文件涉农信息服务高频词分布

1982－1986 年时期，除了服务对象“农民”作为核心词汇之外，“技术”一词出现频率最高，主要话语搭配包括“服务”“推广”“教育”，表现了我国涉农信息服务的主要手段——“农业技术推广”，涉农信息服务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民对于农技信息的需求，这也符合这一时期我国社会技术发展的情况，也反映出这一时期对于涉农信息需求认识的不足；其次，涉农信息服务对象以一般性农民群体和干部为主。这些高频词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文本的话语

秩序：

（1）涉农信息服务对象。对1982－1986年间中央一号文件涉农信息服务对象相关表述进行梳理、提取并编码归类，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1982－1986年中央一号文件涉农信息服务对象涉及文本及其编码归类

表述概念	编码	涉及文本
农民	一般农民群体	农民（D01）农业生产者、劳动群众、社员（D02）农民（D03）农民（D04）农民（D05）
	特殊农民群体	农村知识青年（D03）农村知识青年（D05）
专业户		专业户（D01）专业户（粮食专业户和从事开发性生产的专业户）（D03）
农村基层自治单位及其工作人员	基层干部	基层领导和干部（D02）基层主要干部（D03）基层干部（D05）
农业科技人员	农业科技人员	农村科技人员（D03）
企业	企业	乡镇企业（D05）

由话语分布情况大体可知，1982－1986年间我国涉农信息服务对象为农民、专业户与干部，一般农民群体。农民作为纯粹的信息接收者，接受来自中央及各级党委和政府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基层干部则既是上级信息服务的接收者（如接受上级信息服务机构的信息服务能力培训），又是下级信息服务的提供者（向农民和专业户提供信息服务）。除此之外，随着当时我国国内教育的发展，高考制度的重新开放，国家更加注重对于农村建设人才的培养，对于农村知识青年的信息服务也愈受重视。

（2）涉农信息服务主体。对5年间中央一号文件涉农信息服务主体相关表述进行梳理、提取并编码归类，编码结果显示（限于篇幅原因，编码过程与结果略去）：首先，涉农信息服务主体有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工作人员、集体组织、农业科技人员、科研机构、农民技术员等，与涉农服务主体基本一致（其中农业科技人员、科研机构相当于涉农服务主体中的专业人员），展现了政策话语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其次，我国农民信息获取渠道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熟人”，因此，农民本身也成为涉农信息服务主体，并在政策文本上给予引导和支持。再次，由于这一阶段城市改革如火如荼进行，城市发展居于首要地位，城市对于农村的支持和带动作用十分微弱，在政策话语上表现为仅有1985年简单提及“城市企业”，并未对城市作用进行定位与要求；最后，从20年代50年代起，为了支持农技信息服务，我国建立了农业科技人员制度，从而在涉及文本多次出现“农村/农业科技人员”，也体现了政策话语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和互为话语性（inter-discoursivity）。

（3）涉农信息服务内容与模式。此阶段涉农信息服务内容以生产经营信息和文化信息服务为主，农业生产经营信息以农技推广和农业市场信息为主，包括向农民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和最新成果、开展群众性的技术协作和科普活动（1982）；普及农业科技知识，推广科技成果（1983）等；其次，这一时期，政府对于农民和农业的信息需求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诸如“…技术、信息、信贷等各方面的服务，已逐渐成为广大农业生产者的迫切需要（1983）”等话语多次强调了农民信息需求的出现与变化，政府的意识有了大幅的提升。再次，尽管户籍制度有所限制，城市建设依然在某种程度上为涉农信息服务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如“大中城市要将建立沟通市场信息、组织期货交易的农副产品贸易中心纳入城市建设规划（1984）”等话语。对于文化信息服务，在此阶段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多以隐喻方式呈现，诸如“加强农村各种文化、卫生设施的建设（1983）”等话语表述，其主要方式是修建农村图书馆、图书室。

结合这一时期社会语境背景分析，1982－1986年间中央一号文件对于信息服务的表述多以“恢复”“健全”“改善”“充实”“试行”以及“促进”等词，试图恢复与重建涉农信息服务体系，对于各种涉农信息服务也是“积极支持与指导”。总而言之，这一时期核心话语在文本表述上表现为涉农信息服务主体和对象类型少、涉农信息服务层次较低。

4.1.3　话语实践向度分析　在以为城市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的政策话语导向下，这个时期涉农信息服务的话语实践表现为涉农信息服务基建设施的建设与发展。统计年鉴显示，部分服务站点较1980年相比呈下降趋势，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点1984年为14 035个，1985年为14 242个，1986年为14 425个，每年增加200个左右，而1980年则为15 114个，比1986年多近700个。据于良芝等[2]的研究，由于当时电信业纳入经济改革领域，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农村逐渐被边缘化。尽管这一时期广播电视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总体而言，农村信息基础设施还是相对落后，相关数据如表3所示：

表3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基础设施类型	单位	1980	1983	1984	1985	1986
农业技术推广站	个	15 114	N/A	14 035	14 242	14 425
农村乡文化站	个	N/A	4 050	4 036	47 577	49 815
农村集镇文化中心	个	N/A	7 956	9 236	10 172	10 586
农村装用电话户数	万户	79.9	81.9	86.4	93.1	99.9
农村装用电话机数	万部	132.4	133.7	138.6	149.9	161.8
农村信报站	万处	N/A	N/A	N/A	N/A	22.2
农村村级广播室	个	N/A	175 766	197 249	212 508	225 420
农村通广播的村数	个	594 047	542 050	563 227	554 451	549 712
小片广播网	个	100 152	28 095	21 549	19 950	21 114

数据来源：1980－1984年数据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5》[30]、1985－1986年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86》[31]，由笔者整理归纳

该阶段话语实践的不足其主要原因是涉农信息服务财政投入不足、信息服务的意识与能力不足，对于各类型的信息需求未能安排主要服务主体，从而造成同一种信息需求多个主体负责、部分需求无人问津的现象。在信息服务的内容上，更多的是关注经济领域的信息需求，忽视农民、农村、农业领域对于其他信息的需求，从而呈现上述话语实践。

4.2　2004－2018年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核心话语演变分析

4.2.1　社会语境向度分析　2004年，中央再次发出有关“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三农”问题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农业深化改革进程开启。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表明原有社会语境中从农村提取剩余以促进城市发展的社会实践发生转变，农村发展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主题；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真正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双哺”方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发展在社会整体发展中比以往更加受到重视。城乡交流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使涉农信息服务既成为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4.2.2　文本向度分析　对自2004年起的14个中央一号文件进行梳理，提取其中涉农信息服务核心话语并进行编码归类（限于篇幅原因，略去编码表展示）及高频词统计（词频≥3），结果如图2所示：



图2　2004－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涉农信息服务高频词分布

这一阶段一般性农民群体依然是涉农信息服务的主要对象，农民工、涉农企业等特殊群体也是涉农信息服务重要对象；“服务”一词在2004－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出现了294次，最高词频为37（2013年），远高于“领导”“管理”“指导”等命令式话语表述，这体现了与“服务型政府”话语在政策文本中的一致性；“服务”主要话语搭配“信息服务”“文化服务”“培训服务”“技术推广服务”等，体现了涉农信息服务主要的服务方式及服务手段；“信息”从一开始的“信息服务”话语搭配，到“信息平台”“信息技术”“信息网络”等话语搭配，体现出我国涉农信息服务与时俱进，服务手段不断拓展，应用水平逐渐提高。这些高频词一起构成

了我国新时期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文本的话语秩序，限制了我国新时期涉农信息服务话语建构的边界，形成了我国新时期涉农信息服务政策话语体系的基本框架：

（1）涉农信息服务对象。编码结果显示，尽管农民和干部依然是主要对象，但与80年代涉农信息服务对象相比，有以下较大变化：

• 多样化：涉农企业和农业相关专业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成为重要的服务对象，一是由于过去多年来我国“三农”信息服务有了较大的发展，对于农民和干部的信息服务有了一定的经验，也有了较为成熟的机制；二是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涉农企业和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已经存在并且需要支持；三是在一定程度上，涉农企业和农业相关专业组织起着链接纽带的作用，他们也可以承担针对农民的信息服务，起着辐射带动作用。对于农产品出口企业，在2004年后几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多次提及，这也是新出现的涉农信息服务群体，原因在于2001年我国加入WTO，国际贸易出现并取得了多方位的发展，农业领域的国际贸易由于发展时间短，亟需对他们进行信息服务，尤其是国际农产品市场信息和市场准入，甚至是国际贸易纠纷方面的信息服务。

农民工作为涉农信息服务对象的出现。尽管在1980年当时政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城乡人口流动的宽容，农村劳动力在城镇享受相关权利（教育、居住、自由迁徙）和落户却是在2001年中央政府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后，才有了政策保证。这也就解释了尽管在80年代我国就有了农民工/务工农民这一群体，但是却是在2000年左右才谈及到对于这一群体的信息服务问题。

基层服务队伍作为对象的出现，尤其是农村教师、医生和农技推广人员。随着社会整体意义上的进步，教育、卫生和科技领域愈受社会重视。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相同，教育、卫生和科技领域的发展也是从城市开始，再向农村扩散。同时由于这些领域的特殊性，具有强烈的知识密集型特点，于是教师、医生、农技推广人员的信息服务就变得尤为重要。

• 对象群体的内部分化。农民和干部作为主要对象，在长久的发展中，这两个群体内部逐渐分化。农民群体中，首先是在地域上出现的分化，根据上文，农民群体不仅仅是过去简单的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居民，城乡地域的打破，部分农村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对于这一部分人的信息服务始终是涉农信息服务承担的责任，例如在其外出务工前对其提供劳动力市场信息、技能培训以及其他信息等，近年来针对返乡农民工再创业的信息服务体系构建也引起了很大的讨论[4]；对于留在农村地区生活的农村居民而言，其内部也出现了分化，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如儿童、妇女、老人、身患职业病等农民工和残疾人陈述的出现。对于干部群体，农村党员干部的信息服务在农村干部队伍信息服务中尤为突出，我国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工程作为典型，其目的依然是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村信息化。农业经营主体由专业户向龙头企业、农产品出口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供销合作社等转变，也使得涉农信息服务对象——农业经营主体信息服务逐渐细化。地区也从广域指导（全国范围内）到向地区性指导（如2008年强调对中西部农村和边疆地区骨干教师的远程信息服务、近年来对于“老少边穷”地区农民信息服务的强调等）。

• 农民群体知识水平不断提升。如上文所述，20世纪80年代我国涉农信息服务对象中农村知识青年实现了基于知识水平的农民群体第一次分化，随后有关农民知识水平的话语表述为农村大中专毕业、中高等学校毕业生、高校毕业生、留学归国人员等，同时根据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情况，表明我国农民群体的知识水平在不断提升，而针对这一群体的信息服务也应不断提升其层次。

（2）涉农信息服务主体。这一阶段我国涉农信息服务主体的演变有以下特征：

• 中央及各级党委和政府在我国涉农信息服务中占据着始终不变的主导地位，各部门包括农委、科委、计划、财政、物资、文化和信息等是开展涉农信息服务的支柱部门。

• 集体层次上，农村合作组织（供销合作社、农产品合作组织）、基层管理队伍、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农村服务组织都是涉农信息服务的主力。

• 农业科技人员、农村科技人员、农技推广人员到科技特派员，陈述发生变化但性质未变，农业科技推广人员在涉农信息服务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教育（高等院校、农业院校）、科研（研究院、科研所、农业科研机构）等事业单位在科技信息推广和服务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涉农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经营性农业信息服务企业、涉农中介服务组织起着重要的辐射带动和引导作用。近年来，随着“智慧农业”“农村信息化”“互联网+”“数字农业”等概念的兴起和发展，电商企

业、文化产业等相关企业更加注重涉农信息服务领域。

- 社会力量逐渐参与。从早期的公益性农机推广机构,科技普及协会,各行业的志愿者队伍,到如今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农村公益基金会,社会力量不断渗入到涉农信息服务中。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要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残联等群团组织的优势和力量,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等积极作用。

- 政府不断引导和鼓励农民满足自身信息需求。涉农信息服务主体的规模在不断扩大,类型在不断丰富,层次也不断深入。同时,部分涉农信息服务主体也担任信息服务对象的角色,如农村党员干部在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机制下就是信息服务的使用者,农技推广人员在科技特派员制度下是信息服务的接受者,涉农企业在发展中也需要从政府、行业组织或是协会获取市场信息,这些信息服务获取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提升信息服务主体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从而更好地向农民提供信息服务。

(3)涉农信息服务内容与模式。针对农村居民生产经营信息需求(如技术信息、经济信息、市场信息等)的信息服务,所有涉农信息服务主体均有所涉及。作为在涉农信息服务主体占据主导地位的中央及各级党委和政府,始终提供着多种类型的涉农信息服务。针对农民的科技推广体制、科技特派员制度、气象信息服务机制,针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和信息服务机制、农民工就业信息和劳务信息服务,针对农村基层服务队伍的信息素质培养和信息服务能力提升计划,农村党员干部的农村远程教育计划,针对涉农企业,如技术推广服务、市场信息预测通报服务;针对涉农集体性组织的信息通报服务和信息服务能力培育计划等。从2004年起,中央和地方开始安排专门资金,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开展信息、技术、培训、质量标准与认证、市场营销等服务。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涉农集体组织(农村合作组织、基层管理队伍、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农村服务组织)、教育科研等事业单位、涉农企业、公益性科技推广机构等社会力量以及农民自身。

针对农民和农村居民其他信息需求(如医疗卫生信息、教育或助学信息、社区生活信息)的信息服务中,中央及各级党委和政府依旧发挥着起主导作用。例如对农村远程教育平台、远程医疗系统以及其他农村信息服务平台等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尤其是针对农民文化信息需求的农村图书室、农家书屋等基层文化服务机构、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但是政府在这里更多的是提供涉农信息服务发展的路径与条件支持,实践角度则是由其他涉农信息服务主体来执行,如基层干部、基层服务队伍、部分涉农企业和志愿者队伍等。

4.2.3 话语实践向度分析 这一时期,话语实践体现在:①各种信息服务机制的建设与健全,2003年,"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启动,随后一直是我国农村党员干部重要的信息服务平台;2004年,"村村通电话工程"开始实施,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取得重大发展;2005年,商务部启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持续推进农村电子商务;2006年,"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第二轮)开启。农业部、工信部等按照"六个一""五个一"等标准建设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2009年,科技部、中组部、工信部联合启动国家农村农业信息化示范省建设。"十一五"期间,农村文化信息服务工程重启,农村文化信息服务建设出现第二个发展高峰。②话语实践呈现规模大、覆盖范围广、水平高的特征。目前,我国"县有信息服务机构、乡有信息站、村有信息点"的农业信息服务格局基本形成,农村信息服务机构实现全覆盖。农业部、工信部、文化部等相关部门在全国部署涉农信息采集点8 000多个,远程收集和提供各行业和领域的涉农信息。政府开设了互联网政务、微信服务、政务微博、政务头条号等多种互联网信息服务渠道,多方面满足"三农"信息需求。话语不足则表现为国家长期的"多取少予"政策派生下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农村信息供给方式,对于涉农信息服务的长期发展有着十分不利的影响。尽管现有政策已经试图构建农民自身提供和满足其信息服务的话语体系,但由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和城乡发展差距仍十分巨大,话语的引导性意图仍然难以实现。

4.3 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核心话语演变特征

通过对我国历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分析,发现我国是通过服务对象相关陈述以明确服务归宿、服务主体相关陈述以确定服务归属以及服务内容和模式相关陈述以明确服务主题来构建涉农信息服务话语体系的。由于陈述的演变,我国涉农信息服务从整体来看,具有延续性和一致性、跳跃性和间断性、延伸性和发展性等多维度特征。

4.3.1 延续性和一致性 政策话语的延续性和一致性是对话语互文性和互为话语性的讨论。互为话语性和互文性是指话语体系对历史性话语实践的继承、改造和创新,体现了话语构建的一致性。

自1980年以来,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核心话语的延续性和一致性表现为部分涉农信息服务对象、主体和服务内容的一致性。从涉农信息服务对象上来看,作为涉农信息服务的主要接收者——农民和基层干部在历年政策文本中都有提及,且每年表述概念差异性较小,不同时期的表述基本保持一致;从涉农信息服务主体上来看,自1980年以来,中央及各级党委和政府始终是涉农信息服务主体的主导力量,集体组织、科研和科技服务机构、相关企业、基层服务队伍、和农民自身是我国是涉农信息服务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话语演变上也保持对上一年或是过去几年文本语言的继承和延续;从涉农信息服务内容上,农业科技信息服务和文化服务自1980以来都是我国涉农信息服务内容的核心,每一年的涉农信息服务都会有所涉及并依据社会语境特征进行改造和创新;从服务模式上,一直是以政府为主导,其他力量辅助和支持来促进我国涉农信息服务的发展与前进。

4.3.2 跳跃性和间断性 从中央一号文件涉农信息服务两个阶段的话语分析,前一个阶段重点在对农业经济信息和科技信息需求的满足,主要服务对象群体相对简单(农民和干部),同时服务主体侧重于政府及其延伸机构,服务手段侧重于传统媒体。而在第二个阶段,信息需求的覆盖面已经生产和经济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服务对象群体呈现多元化特征,服务主体也扩展至包括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的多元供给主体,服务手段转向以互联网和传统媒体并行的局面。其中的政策话语呈现出显著的跳跃性特征。

在两个阶段之间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涉农信息服务主体能力与意识,还是服务对象的接受能力与意识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在技术上,1986年,我国农业部开始组建农业部信息中心,农牧渔业信息管理系统成为我国农业服务信息化的先驱。1994年我国正式加入互联网,同年,“金农工程”提出并开始实施。1997年和1998年,国家农业综合门户网站——中国农业信息网(www.agri.gov.cn)和中国农业科技信息网(www.cast.net.cn)相继建成,这些都表明涉农信息服务受到足够重视。这些关键性的实践活动未能及时体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当“三农”问题再次以一号文件出现的时候,呈现出与有别于前一阶段鲜明的间断性特征。

4.3.3 延伸性和发展性 政策核心话语的延伸性与发展性是指对于政策话语的发展与创新。在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核心话语演变中,延伸性与发展性表现为涉农信息服务对象的多样化拓展(如农民工群体、除基层干部以外的农村基层服务队伍——教师、医生、文艺工作者等)和部分涉农信息服务对象的内部分化(如一般农民群体分化出弱势群体、农民工群体等,涉农企业开始以企业性质为划分依据进行个性化信息服务);涉农信息服务主体的规模不断扩大,类型不断丰富,层次不断深入;涉农信息服务内容呈现制度化、规模化、个性化特征,涉农信息服务服务体系的形成,都是对于过去涉农信息服务政策话语的创新与发展,结合不同时期的社会语境与话语实践经验,形成新的陈述集合,从而构建与成就不断革新与发展的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话语体系。

4.4 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未来话语方向

涉农信息政策文本话语是涉农信息服务政策制订者依据特定的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制度性等)规则,运用语言构建知识、表达意义的陈述集合。由前述分析不难发现,涉农政策话语演变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渐进特征,对当下涉农信息需求的回应越来越注重服务对象的“可行信息能力”[32]。可行信息能力是信息主体能够满足自身信息需求的实质自由,受到结构性因素和能动因素的共同制约。当前涉农信息服务政策话语主要集中在经济条件、基础设施、信息资源等结构性因素方面,面对农业生产、农村生活、返乡创业等多重信息需求,未来的涉农信息服务政策在继续完善结构性因素的同时,应当更多关注服务对象的能动性因素,例如信息意识和信息技能的提升。因此,涉农信息服务政策话语的方向体现在:①文本上保持其科学性、一致性和连续性,并且注重话语体系的健全;②同一指向的涉农信息服务政策可能涉及多元服务主体,不同服务主体的政策话语的逻辑连贯性更加完整;③在话语实践中,多元行动主体的实践活动趋向更加高效的协同性。

5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我国涉农信息服务可以划分为1982－1986年以及2004－2018年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恢复重建阶段,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农业经济地位下降、涉农信息服务意识薄弱等因素导致涉农信息服务主体和对象类型少、涉农信息服务层次低、内容少,基建总体发展缓慢;第二阶段由于“双反哺”方针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始实施、户籍制度放开促进人口流动、经济全球化促进农业活动区域的延伸以及

各种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涉农信息服务不局限于传统的农民、农业活动以及农村地域，其对象呈现多样化特征，服务主体规模扩大、类型丰富、层次深入，服务内容呈现制度化、规模化、个性化特征，涉农信息服务服务体系逐渐形成。总体上，我国涉农信息服务政策话语呈现具有延续性和一致性、跳跃性和间断性、延伸性和发展性等多维度特征。

通过三个向度的分析表明，尽管政策已经构建了具有指导性意图的话语体系，但是实践却未能表现，这种偏差则体现出我国涉农信息服务存在的一些问题。在未来工作中，基于政策话语的演变特征把握，在特定话语体系中构建提升信息服务对象可行信息能力的对策将成为进一步研究重点。例如，尽管由于“一号文件”的政策指引，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社会主体几乎都参与了涉农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但到达乡镇层次及其以下就很难保证所需资源的有效配给，在村民自治组织这一层级这种资源匮乏就更加显著，这种局面导致相应信息服务平台和信息服务手段都难以在“最后一公里”真正发挥其作用，信息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也难以满足农民多样的信息需求。此外，多头参与导致的权责不一致也使得即使政策文本做出某种意图，也可能无法成就话语实践。

此外，本文的政策话语分析语料仅基于19份中央一号文件，鉴于中央一号文件的宏观指导定位，尽管在揭示话语实践偏差方面具有较好的有效性，但由于其无法有效涵盖政策文本的具体方面，在话语实践对策的构建方面难以保证其精准性。在未来研究中，基于更多具体政策文本开展话语分析，并结合特定涉农信息服务情境，有助于实现更加精准性涉农信息服务对策的构建。

参考文献：

[1] 于良芝，张瑶.农村信息需求与服务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J].图书馆建设，2007(4):79－84.

[2] 于良芝，谢海先.当代中国农民的信息获取机会——结构分析及其局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39(6):9－26.

[3] 陶建杰.新生代农民工的信息需求及影响因素研究——兼与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J].人口与经济，2013(5):48－55.

[4] 樊振佳，程乐天.面向农村创业的信息服务体系：政策分析和田野调查[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7,43(3):87－103.

[5] 杨靖，黄京华.构建图书馆三级支撑体系提升西部农村留守儿童媒介素养[J].图书馆建设，2011(5):32－36.

[6] ADOMI E E, OGBOMO M O, INONI O E. Gender factor in crop farmers' access to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in rural areas of Delta State, Nigeria[J]. Library review, 2013,52(8):388－393.

[7] LECKIE G J. Female farmer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access to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 1996, 18(4):297－321.

[8] SHAIFUDDIN N, AHMAD M, WAN N H W M. Rural youth's perceptions of information sources and rural library services[J]. Library philosophy & practice, 2011, 47(8):176－194.

[9] 李静.陕西农村信息服务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基于农村居民需求[J].图书馆论坛，2014,34(3):53－59.

[10] 刘敏，邓益成，何静，等.农民信息需求现状及对策研究——以湖南省农民信息需求现状调查为例[J].图书馆杂志，2011,30(5):44－48,62.

[11] REBECCA J M. Providing interlibrary loan to health workers in medically underserved rural areas: an area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in action [J]. Journal of inter library loan, 2007,17(3):41－48.

[12] MEHRA B. Mobilization of rural libraries towar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J]. Library quarterly,2017, 87(4): 369－390.

[13] MEHRA B, BISHOP B W, PARTEE R P. Small business perspectives on the role of rural librar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 Library quarterly,2017, 87(1):17－35.

[14] MEHRA B, BLACK K, SINGH V, et al. What is the value of LIS education?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he perspectives of Tennessee's rural librarians [J]. Journal of education for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011,52(4):265－278.

[15] 张莹.齐齐哈尔市农村信息服务平台现状与优化研究[D].大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2017.

[16] 马凌，侯正伟.推进我国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的研究[J].改革与战略，2009, 25(6):104－107.

[17] 赵旺.面向农家书屋的网络新媒体信息服务系统研究[D].郑州：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2017.

[18] 金武刚.农家书屋与农村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融合发展探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40(1):84－92.

[19] 吴汉华.国内民间图书馆研究综述[J].图书馆建设，2013(6):1－7.

[20] 王子舟，吴汉华.民间私人图书馆的现状与前景[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36(5): 4－13.

[21] 张广钦.民营图书馆的界定、类型与研究现状[J].图书情报工作，2007,51(1):6－10.

[22] 张健.农业高校图书馆为现代农业建设提供信息服务探析[J].高校图书馆工作，2008(5):56－58,77.

[23] 李红霞.地方高校图书馆为区域农业提供信息服务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4,42(1):282－283.

[24] 孙国华.中华法学大辞典(法理学卷)[M].北京：中国检查出版社，1997.

[25] 于良芝.图书馆情报学概论[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6:94.

[26] 于良芝，李亚设，权昕.我国乡镇图书馆建设中的话语与话语性实践——基于政策文本和建设案例的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42(4):4－19.

[27] 李亚,尹旭,何鉴孜. 政策话语分析:如何成为一种方法论[J]. 公共行政评论,2015, 8(5):55 - 73.
[28] 胡雯. 费尔克拉夫话语分析观述评[J]. 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 18(6):63 - 65,70.
[29] 费尔克拉夫. 话语与社会变迁[M]. 殷晓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30] 国家统计局农业统计司.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85[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
[31]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统计司.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86[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
[32] 樊振佳,程乐天. 可行信息能力:一个信息分化问题学术概念的构建与阐释. 图书情报工作,2017,61(13):19 - 30.

作者贡献说明:

汪汉清:数据采集、论文撰写与修改;

樊振佳:研究设计与论文修改。

Core Discourses Evolu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e-related Information Service Policies: Based on No. 1 Documents since 1980

Wang Hanqing Fan Zhenjia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Business School,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tries to study the construc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core discourse system of Mainland Chinese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policy since 1980, analyze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discourse formation, count and describe the discourse practice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targeted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Method/process**] By the method of qualit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took Central Document No. 1 as an example and based on Fairclough's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alyzed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service policy text and its core discourse from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text, discourse practice and social environment since the 1980s, then the policy discourse were extracted, coded and classified. [**Result/conclus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Chinese agriculture related information service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since 1980. The first stage is 1982 to 1986 which call recovery period and it showed few agricultural-related information service subject contents and object types, and a low level of information-related services. Mean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is generally slow. The second stage is from 2004 to the present, the agriculture-related information services not limit to traditional communities, activities, and rural areas. Not only have the objects been expanded, enriched and extended, but also the subjects. The activities have been institutionalized, scaled, and personalized,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system of agriculture-related has gradually taken shape. Each of the two stages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but on the whole, has continuity and consistency, extens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information service policy text discourse analysis Central Document No. 1